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續編

# 清代稿鈔本

第五一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續編

# 清代稿鈔本

第五一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主編 桑兵  
副主編 李昭醇

程煥文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續編清代稿鈔本 /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編. —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218 - 06038 - 5

I. 續… II. ①廣…②中… III. 中國—古代史—史料—清代 IV. K249. 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89963 號

---

選題策劃  
經 營  
特邀編輯  
責任編輯  
責任技編  
出 版  
印 刷  
排 版  
開 本  
印 張  
插 頁  
字 數  
版 次  
書 號  
定 價

廣東大沿海出版工貿有限公司

陳劍文

柏 峰

王 雷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偉龍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廣東匯文出版印務有限公司

787 毫米×1092 毫米 1 / 16

1890. 5

100

50240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18 - 06038 - 5

35000. 00 元

ISBN 978-7-218-06038-5



9 787218 060385 >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    |     |     |
|-----|----|-----|-----|
| 马大正 | 于沛 | 朱诚如 | 成崇德 |
| 李文海 | 陈桦 | 邹爱莲 | 孟超  |
| 徐兆仁 | 戴逸 |     |     |



# 續編清代稿鈔本

## 編輯出版委員會

主任：林雄

副主任：方健宏 朱仲南 陳俊年 曹淳亮 黃尚立

編委：王桂科 李夏銘 姜家修 秦穎 戴和

楊亞基 陳海烈 盧家明 黎岳梁

## 整理編選委員會

主編：桑兵

副主編：李昭醇（項目主持人） 程煥文

編委：倪俊明 林子雄 林明 柏峰

整理人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肖卓 肖玲 林銳 馬德鴻 陳曉玉

黃琦琨 梁笑玲 蒙碧玉 謝暉

# 晚近史料的編輯出版與學術研究

——主編的話

清代以來，中國史料的種類與數量大幅度擴張，規模大大超過歷代文獻的總和。而搜集閱讀之難，逾於古史，史料的保存狀況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澤而漁，甚至難以把握邊際的情況下，學人或分門別類，縮短戰綫，或隨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固，后者隔義附會，使得歷史研究的整體性逐漸流失，盲目性不斷增大。治史須先因后創，由博返約，先識大體，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坐井觀天，甚至指鹿為馬。要想改變晚近史料收藏與利用的兩難，恢復史學應有的整體性，當務之急，必須解開收藏、研究、出版各界相互制約的連環套，多快好省地大規模出版各類文獻資料，使得學人處於大體平等的資料條件基礎之上，改變那種以為歷史的大體和真相基本還塵封於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誤解，不僅有助於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等文獻收藏機構乃至藏書私家擺脫資料保存與公眾利用的兩難，而且促使學人將重心由看得到轉向讀得懂，由借助外力條理史料轉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內在聯係，並且因緣史料的繁多，探究進一步處理史料與史學複雜關係的良法，從而化弊為利，改善提升研究的格局與水準，以求在深度與廣度上超越古史。

今人研治晚近歷史，常常遭遇資料易得而難求其全的尷尬，由此引發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難題，直接關係到研究的高下優劣，得失成敗。其中至少有三點牽涉全局，其一，迫於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縮小範圍，分段分類的專門之學日趨精細。可是隨着專題研究的細分化，歷史相互聯係的整體性逐漸喪失，不知具體在整體中的恰當位置與意義，反過來具體研究的準確度也會大打折扣。分科治學起於晚清，而史料並不按此設列，用分科眼光看史料，即用後來觀念解讀前事，難免以偏概全。專門化逐漸形成小圈子的學問，參與者的能力決定其整體的水準。若無高明者領軍，難免等而下之。其二，細分化並不能解決史料邊際無從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題目，要想窮盡史料也幾乎不可能。以索引找資料，則會遺漏大量從題目、關鍵詞不可見的重要史料，並且因為不知研究對象的關聯範

圍，也就難以把握主題的史料邊際究竟何在。由此出現相反相同的兩種情形，或找不到材料（往往視而不見），或材料太多不能駕馭。於是研究一個題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種程度才可以出手，變得難以拿捏捉摸。研究的情勢有如秉燭夜行，燈下黑與不遠見均不可免。其三，由於資料收藏和學人境遇的限制，研究者的資料接觸處於不對等狀態，又片面強調或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結果人所周知的書都不看，一心搜尋前人未見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態度讀書，以看得到掩飾讀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壟斷材料為研究基礎，結果過度依賴對於材料的獨佔，導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為視野範圍，不看其他相關材料，最終勢必以其是非為是非，或者以某一類資料為可靠，以為材料即事實，於是只看這一類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資料，不能相互參證，非但事倍功半，還容易誤判錯解。

以上三點相互作用，治史如同摸黑盲行，導致本來具有綜合性的歷史研究日益支離破碎。而這一切，均與晚近史料邊際的模糊緊密關聯。歷史研究的史料邊際，首先是整體的規模、範圍與系統。史學為綜合的學問，須先廣博而后專精，由博返約，讀完書再做研究，所謂「通學在前，專精在后，先其大體，緩其小節，任何一門學問，莫不皆然，此乃學問之常軌正道」<sup>①</sup>。可是，這樣的常軌正道在晚近史的領域，却顯得懸的過高，相當奢侈，甚至強人所難了。中國文化發達甚早，為了維繫千差萬別的廣大地域的統一，巧妙運用文言分離的功能，極其重視文字的功效，與之相關的發明多而且重要。中國古代典籍號稱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從世界範圍看，此言不虛。可是與晚近比較，古代史的資料顯得相當有限。《四庫全書》共收書三千五百餘種（各本略有出入），存目六千八百餘種，禁毀書約三千一百餘種，合計也不過一萬三千餘種。其中相當一部分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僅存目書即十居四五）。至於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藝文志》和武作成編述《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共收錄清人著述二萬餘種，王紹曾主持編纂的《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在《清史稿·藝文志》及《補編》之外，著錄清代著述五萬四千餘種。而據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和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僅詩文集一項，即達四萬餘種之多。除去乾隆以前重合部分，也已經超出修《四庫全書》之前中國書籍的一倍。考慮到著錄遺漏

① 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辭》，《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五五年，第六頁。

等因素，清代典籍總數當在八至十萬種，大大超過歷代的總和。<sup>①</sup>

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數量龐大的典籍，只佔整個清代文獻的一部分，而且還是小部分。中國內地檔案館系統收藏的清代檔案共二千餘萬件（冊），其中百分之五十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其餘散置於各地檔案館。這還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檔案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系統所藏的檔案（其實檔案只是存放資料方式的類型，而不是資料的類型。檔案中的函電、官文書等，很難與其他機構或私人的收藏區分。如清季諮議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別入藏檔案館或圖書館）。臺灣和歐美、日本等，也分別收藏了數量不等的清朝檔案，總數至少有數十萬件。<sup>②</sup>

報刊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類，而且數量更加鉅大。據不完全统计，自一八一五年中國的近代報刊創刊以來，至一九一一年，在中國和海外共出版中文報刊一千七百五十三種，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刊一百三十六種。<sup>③</sup>就種類而言，清季報刊的數目似不算大，多數報刊的壽命較短，可是也有一些持續時間長，發行卷數多，尤其是日報，日積月累，且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清季報刊受體制和立場的局限，道聽途說與一面之詞不在少數，若將不同背景的報刊相互比勘，並與其他類型的資料彼此參證，可以補充連續性活動和細節記述的不足，並且測量社會的反應。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閱讀報刊，能夠逐漸回到歷史現場，感同身受，從而對當時的人與事具有瞭解之同情。

各種形式的民間文書，數量同樣龐大，僅各大圖書館藏家譜就有兩萬餘種，以清代居多。這類材料，以前一般不為學人所注意，五四以後，才開始收集。一九二〇年代北京大學國學門收集並展出風俗物品，還遭到非議。除個別類型之外，各公私圖書館一般少有收藏。近年來，隨着研究層面的下移，這類資料越來越為學界所重視，

① 參見戴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總序》，辛得勇《談清人著述的目錄與版本》，《中國圖書評論》二〇〇五年第八期，第三十三—三十五頁；蔣寅《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備的工具書——〈清人別集總目〉評介》，《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〇一年第三期，第九十七—一百頁。

② 參見馮爾康《清史史料學》（瀋陽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四章「檔案史料」；鄒愛蓮《清代檔案與清史修撰》，《清史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三期，第一至十頁。

③ 史和、姚福中、葉翠娣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前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頁。

但與資料存留的數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規模進度，仍然相當滯后。

以上所述，還有不少遺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記、函札乃至詩文集，未刊者甚多，僅日記據說已經掌握信息的就有千餘種。近來編輯出版的《清代稿鈔本》第一輯（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共收錄日記二十二種、詩文集一百四十餘種和清季廣東諮議局及相關文件二十餘種，其中相當部分為各種目錄書未曾著錄，而史料價值極高。有的已為海內外學人所關注，如杜鳳治的《望臆行館日記》。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間在廣東各縣為官，每日記事頗詳，可供各種專題研究解讀利用。后續各輯還有不少未刊稿鈔本。如晚清廣東大儒之一的陳澧，一生著述極多，隨著隨刻，又不斷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內容與坊間刊本多有不同。由於種種原因，原稿本僅存其半，利用極難，另一半或已散佚及流入境外圖書機構，而據原稿鈔錄的鈔本則大體完整。翻譯書和教科書，為晚近新有，前者關係中外，后者乃社會化憑藉，均為主要知識載體，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錄較少著錄，迄今為止，連確切數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內外學人關注者甚多，已漸成所謂研究熱點，而所見明顯不足，倉促立論，未能至當。

此外，晚清以來，中外交通頻繁，各國公私檔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軍事、商務部門，教會、公司、傳媒、團體組織等機構，以及相關個人的文書），大量涉及與中國的關係。陳寅恪早年批評民初撰修清史過於草率，特別指出：『自海通以還，一切檔案，牽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國外交當局調閱不可，此豈私人所能為者也？』<sup>①</sup>邊疆史料，不詳於中國載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記載，非徵譯海外著述不可。<sup>②</sup>如將海外各類檔案著述收羅完整，史料的數量還將大幅度擴增。

文獻的幾何級遞增，與印刷技術、出版機構的改進普及密切相關。尤其近代以來，發展迅速。晚清七十年，時間約佔清代的四分之一，文獻數量的比例却遠不止此數。民國以後，出版擴張的速度更快，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根據北京、上海、重慶三家圖書館的藏書編輯的《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一九九五年），共收錄三十七年間出版的各類中文平裝圖書十二萬四千餘種，超過整個清代圖書的總和。

<sup>①</sup> 陳守實：《學術日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二二頁。



檔案方面，據《全國民國檔案通覽》（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編委會的不完全統計，全國一千多家各級檔案館共收藏民國檔案一千四百萬卷，即使平均一卷只有十件，也是明清檔案的七倍。報刊更加驚人，截至一九四九年，中文報刊的總數至少達到四萬種以上（其中報四千餘種，刊三萬六千餘種）。照此估算，則清季報刊僅佔三分之一。

目前已知的晚近史料已經不勝其煩，而擴張的速度幅度又極快極大。《清史稿·藝文志拾遺》著錄書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編撰者仍然坦承「未見書目尚多」<sup>①</sup>。況且，各書目大都依據前人所編目錄，並未核對各館庫藏原書，從《清代稿鈔本》的編輯以及其他相關情況看，各圖書館有書無目或有目無書的現象不在少數。非公共性的公家圖書館，既不對外開放，管理人員又缺乏專業訓練，編目更難完善。而博物館系統，限於體制，所藏文獻均作為文物，內部人員也難得一見廬山真面。至於私家收藏，秘不示人，尚有許多信息未曾公開。尤其是近人的函札、日記、著述等未刊稿本，躲在深閨人未識的為數不少。

《民國時期總書目》的編輯原則是必須見書，因而有目無書的就只能闕如。綫裝書、少數民族文字和外文圖書暫未收錄。中小學教材僅收錄人民教育出版社圖書館和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部分藏書，未及上海辭書出版社及全國其他重要圖書館的相關藏書。少年兒童讀物，則三家圖書館漏藏或不入藏者較多。臺灣、香港及邊遠省份出版的圖書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國時期還有不少書籍因為政治、道德等原因遭到禁毀，其中既有政府行為，也有行業（如書業公會）自律，尤其是後一種情況，銷毀相當徹底，海內外公私收藏甚少。這些都影響了收錄的完整性。加之書目的編輯未兼收全國其他重要圖書館的藏書，雖然後來調查認為遺漏不多，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可是因為基數太大，百分之十就是一萬二千種，幾乎相當於清以前歷代圖書總和的一半！

報刊方面，據中國五十個省市級以上圖書館所藏，僅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的中文期刊，三次編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一九六一年首版未收錄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黨刊、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建國前解放區出版的期刊，以及國統區出版的部分進步刊物。一九八一年增訂本加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兩萬種。據「編

① 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前言》，《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上，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第二三頁。

例」，「僅收錄比較有參考價值的品種。縣級以下的期刊和有關中小學與兒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選收。至於純屬反動宣傳、誣淫誣盜以及反動宗教會道門等毫無學術史料參考價值的期刊，不予收錄。偽滿、偽華北、汪偽等漢奸軍政機關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學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錄。」<sup>①</sup>以今日的眼光看，這些刊物的學術參考價值當然不言而喻。所以，從一九八五年底起，由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共同主持，全國五十六個省、市、大專院校圖書館參加，編輯了一本補充目錄，共補收期刊一萬六千四百餘種，其「編輯說明」特意強調：「其中包括：珍貴革命刊物，國民黨、政、軍刊物，抗日戰爭時期敵偽刊物，中小學教育刊物，兒童刊物，文藝刊物等」<sup>②</sup>。目前國家圖書館縮微中心以全國各圖書館藏為底本製作成縮微膠卷的報已達兩千九百種，刊一萬餘種。晚清民國號稱史料大發現的時代，所重主要還在古史，而各類新發現的古史資料相加，與近代史料的擴張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謂九牛一毛。

如此大量的資料，任何一類，都已經超過歷代各類資料的總和，疊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負的壓迫感。再具體的題目，要想窮盡材料，也戛戛乎其難。面對數量龐大，各項編目工作嚴重滯后，規模不斷擴張，系統無法把握的史料狀態，研究者的確很難做到胸有成竹。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史料繁多，目錄不全，學人反而不注意由目錄入手，把握整體，探索系統。不要說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態度從目錄看學術的淵源流變，作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夠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下，史料掌握到何種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證大體不錯，將來材料進一步發掘披露，可以補充，可以局部調整，甚至可以個別細節正誤，但基本判斷和方向正確，後續研究只是加強，而不至於顛覆原有成果，其成果更不僅僅是發表見仁見智的議論，便成為相關歷史研究的難題，同時也是史學藝術一面的奧妙所在。

解決晚近史料邊際模糊的一大障礙，是資料的收藏、出版與利用條件，與史料的規模價值相比，極不相稱。

① 全國第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增訂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頁。

② 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主編：《一八三三—一九四九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補充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頁。

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理、出版等環節，形成難以解脫的連環套，導致史料的收藏單位、出版機構、以及讀者和研究者糾葛纏繞的諸多困擾。

晚近史料雖然數量龐大，種類繁多，收藏却相當分散，查訪、搜集、利用極為不便，同一種書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種報刊、同一人的日記函電、甚至同一部書的不同部分，分別藏於兩家乃至多家圖書館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圖書館因為這類資料的數量龐大，版本內容雜亂，牽涉中西新舊不同分類，很難全面梳理分別，評估把握缺乏恰當的準則，又大都够不上古籍善本的標準，只能採用一般規格收藏保存。而其中晚清以來的各類史料雖然時間不過百餘年甚至不到百年，因為普遍改用機製紙，可以存放的時間遠不及古籍久遠，加以保管條件相對較差，閱讀者又較多，磨損、霉變、蟲蛀、鬆脆等情況相當嚴重。對此，不少圖書館採取收費、限制借閱甚至禁止借閱等措施，但是一來不準翻閱未必能够收到保護文獻的效果（有時反而更差），二來晚近史與今人關係密切，研究和關注者日益增多，限制措施加劇了圖書館與社會公眾及研究者的緊張關係，使其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隨着納稅人意識的增強，壓力還會進一步加大。長此以往，公共圖書館方面收藏保存與借閱服務的兩難局面勢將日趨嚴重。

一九三一年清華大學二十週年紀念，陳寅恪撰文縱論《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文末專門論及圖書館事業：『雖歷年會議，建議之案至多，而所收之書仍少，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況中西目錄版本之學問，既不易講求，購置搜羅之經費精神復多所限制。近年以來，奇書珍本雖多發見，其入於外國人手者固非國人之得所窺，其幸而見收於本國私家者，類皆視為奇貨，秘不示人，或且待善價而沽之異國，彼輩既不能利用，或無暇利用，不唯孤負此種新材料，直為中國學術獨立之罪人而已。』<sup>①</sup>四分之三世紀過去，這樣的狀況早已大有改觀，但是具體到晚近史的研究，盡管近年來文獻資料出版的速度明顯加快，規模已然不小，陳寅恪當年痛心疾首的情形某種程度仍然存在。

<sup>①</sup>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三六二—三六三頁。

研究者同樣面臨兩難，史料量大、分散、雜亂，使得學人或過度依賴資料，或全然不受資料約束。一方面，因為條件限制，掌握資料的難易程度相去甚遠，學人實際上處於不對等狀態，坐擁書城者可以足不出戶，而選題幾乎無拘無束，否則四處奔波，所治範圍還須嚴格限定。龜縮於一地一人，雖然可以揚長避短，但也難免舍本逐末。長此以往，容易導致以無可奈何為大勢所趨的虛幻自大。另一方面，壟斷資料造成對資料的迷信，由此產生兩種看似相反而實相同的偏頗，一是所謂燈下黑，身邊易見的書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見的材料，不知歷史的大體已在一般書中，舊材料不熟，不能適當解讀新材料；二是只看自己擁有的秘笈，不與其他相關資料相互參證，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見所知為全部事實，結果以其是非為是非，盡信書不如無書。而在細碎化的專題研究之下，材料的限制使得成果很難被重新驗證，研究者敢於斷章取義，強材料以就我。於是，因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開地提供給所有的研究者，使得以找材料的態度讀書，用看得到來掩飾讀不懂的偏向不斷加劇。同時，正因為找不到不全，或者則干脆不顧史料，以舉例為歸納，以斷章取義的隻言片語為論據，鑿空逞臆，輕率立論，無視能否貫通史事與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難題。晚近史料的多、散、亂，保存狀態的惡化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強，導致整理的極端困難，出版也就無從談起。由於不少資料具有唯一性，收藏單位往往向閱讀、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額磨損費，若是作為出版之用，所收底本費和磨損費有時更是如同天價。出版近代史料，卷帙浩繁，投資成本高，銷售風險大，再加以高額底本磨損費用，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如果的確出於保護文獻的目的，未可厚非，可是有時態度做法與聲言的動機目的距離不小。除了國家財政、法規上有一些不合理的規定外，收藏單位的觀念嚴重滯後，當為主因。公共圖書館、檔案館並非舊式私家藏書樓，提供服務為天經地義，因為其職責只是代納稅人管理公共財產以供社會公用。而目前以古籍整理辦法出版近代史料，進度太慢，遠遠趕不上史料毀損的速度，況且近代史料校勘，至少不比古代容易，全用標點整理，能够勝任的學人大都無暇，目前的評估體係又不鼓勵，水準不夠，難免亂來。今人整理點校的各種近代文獻，錯誤隨處可見，即使高明者，因為今典本事太多，很難掌握周詳，也無力面面俱到。在傅斯年等人反對疎通的影響下，本來作為史家基礎的文獻註疏，變成文獻學者的專門，又分屬文史兩科。治史者不讀書而一味找材料，做專題研究，文獻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專題研究訓練出來的學人，好將個別

經驗放大，往往喜歡擅改前人用字，猶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史之學，改訂舊文，多任己意。<sup>①</sup>加之原本難得一見，即使心中疑惑，也無從比勘正誤。整理出版者費力不討好，只能裹足不前。

根據現狀，首要應是如何在較短時間內盡可能地大規模照原樣出版近代史料，以實現保存與使用的雙贏。理想的方式，當然是在國家的統一組織和協調佈局下，調動各級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面的人力物力，以適當形式發揮各自的積極性，分工合作，有計劃按步驟地有序進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由兼通各面的適當人選主持其事，將是較為完善同時也是最為合理節省的途徑。但從目前情況看，各方面的認識差距較大，短期內難以達成一致。尤其是細分化的格局之下，圖書、檔案、出版、學術等部門關於整理出版史料的觀念態度做法各不相同，學術界的不同學科甚至不同研究時段之間也是意見分歧，極少能夠統合全局，兼顧各方。各執己見往往不過單一角度的所謂行規，而分的眼光其實是後來認識的局限，並非天經地義的道理。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竊以為切實可行的辦法，惟有以收藏機構為單位，大規模分類影印出版，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實現。具體辦法為：

一、史料收藏單位（包括私人藏家）願意開放並提供所有底本。目前圖書館和檔案館對於大規模出版相關資料的意見不一，如《清代稿鈔本》的出版，首先得益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開明，他們相信圖書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現代圖書館的理念和完全開放的態度，願將所有館藏貢獻於海內外同好和社會公眾。在其帶動下，廣東省內其他圖書館也有意效法。據說最近海外有的著名中國研究機構已經準備有步驟開放所藏文獻，嘉惠學界同好，可見這樣的理念已是大勢所趨。

二、精選底本。歷來學人與藏家、書商關於收藏出版的眼界迥異，大規模出版晚近史料，應當轉變觀念，取捨主要根據內容和研究需求，注重存世的多少，兼顧版本。具體辦法為：優先收錄日記、函電、文集等未刊稿本鈔本，其次為孤本珍本，再次為內容、版式等有異的刻本。

三、參照實情，借鑒沈雲龍編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之法，放棄因噎廢食的求全求精，不拘一格，根據願意提供底本單位或個人的收藏情況，相對集中，原來分列的個人詩文集合併，同類文獻則匯集編排。報刊或分時

① 陳寅恪：《劉叔雅〈莊子補正〉序》，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二五八頁。



段，或依類型（據形式或內容）。

四、原版影印。最簡單的辦法往往最正確，最有效。目前文獻整理出版要求校勘標點，而晚近史料過於龐雜，內容紛繁，又缺乏能够勝任整理之責者，整理的進度遠不及資料毀損的速度，整理的效果則未見理想。原版影印，可以在最短期限內大批複製，保證不走樣。待到能够直接、廣泛接觸史料者漸多，然後從容從事優選整理工作，並有反復驗證的條件，收效自然可望精進。

這樣做或許與現行古籍整理的原則標準不盡一致。如果上古、中古、近代史料遺存的多寡制約不同時段史學研究的重心辦法的差異，則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能削足適履，強求與古代一律。本來學人與藏書家看書的眼光差別不小，黃侃、陳垣、錢鍾書等人對此早有論述。目前通行的古籍整理，不無偏重於藏書家眼界之嫌，未能兼顧或主要以學人眼界為取捨。用於晚近文獻的整理出版，更加難以適應。

晚近史料要探明邊際，目錄編輯首當其衝，把握文獻大要，才能逐漸明晰。但也不能僅僅停留於編目，尤其不能停留於依據編目而做目錄。各圖書館收藏的文獻往往不完整，需要互相補充。報刊部分最為突出。近代報刊發行渠道不穩定，暢銷時很快再版，有時甚至連續三版四版，而首版與再版的版式、序號、廣告、插頁等等，常常有所變動。首版本不易得或難得其全，如果強求，則大都無法操作，只有暫時兼用不同版本。有時藏本太少，不僅版式難期一律，連退而求其次的將就兼用，也遭遇重重障礙，與其袖手等待，不如因陋就簡，將來再漸次補齊。稿鈔本甚至刊本也有類似情況。如陳澧的手稿及鈔本的來龍去脈，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分散在境內外若干家圖書館，而各家對於出版一事意願差距較大，或限制太嚴，或索價過高。如果強求完整才能出版，則只能束之高閣。如此，不僅出版遙遙無期，研究者由於看不到各家藏本，無從下手研究，不得不輾轉求證，人云亦云。如果先將願意公諸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則可以推動出版，因為雖然有的機構收藏較多，既非完璧，亦非獨有。尤其是刊本部分，割據封閉則佔有優勢，各家盡出，則壟斷不復存在，資源優勢逐漸降低，態勢必發生變化。隨着各家收藏單位出版意願的增強，出版成本相應下降，陸續倣效，終成完璧的時間指日可待。二則有助於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即使其他幾家未刊，學人也可於閱讀時逐一比勘，以免循環反覆。如果因為懸的過高（且往往片面）而止步不前，恰如近代追求國民教育的高標準，結果反而使得大批貧民子弟無書可讀。

或者擔心未經任何整理標注，讀者無法使用。這多少有些杞人憂天。沈雲龍所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匯集當時在臺灣及海外所能找到的有清以來各類史料，未做任何導讀解說，甚至沒有一定規則，可謂抓到什麼算什麼，却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研究生使用得最普遍的資料匯輯。如果連這樣的資料也無法解讀運用，則根本不能下手研究。比較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盡管編輯方針確定對史料不加分析判斷，但依照時間順序分為十二個專題，並有歸類，等於建立起一套體係框架。即使諸如此類編輯整理的資料，也不可能掃除所有的閱讀障礙，反而可能約束讀者。近年來各種再版書籍的導讀或史料編輯的說明，固然不乏佳作，可以指點迷津，但也有暴露編者認識的局限，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偽劣，誤導衆生。傅斯年認為，史料越生越好，以免將後來的主觀強加於人，不僅誤讀錯解當時的人事，而且將豐富多彩的歷史用一定的框架來局限，反而減少其應有的內涵和價值。此說固然有抹煞一切前人主觀，將書僅僅當作材料的偏蔽，忽略了前人的主觀，也是歷史真實的有機成分，只是其真實性不一定相對於所記錄的史事，而是記錄的態度。但是正如考古發掘一樣，以今日的認識能力與技術手段，大量的重要信息在發掘過程中勢必遭受破壞，甚至永遠消失。盡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樣，留待來者，才是最理想的方式。

沈雲龍的叢刊所收錄的資料，限於條件，已經竭盡所能，相比於總量，不過百分之一，還是能够嘉惠世界學人。從研究的角度看，晚近史料的出版，應以所能提供文獻的數量、版本、內容、保真程度為據，不宜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標準和辦法來衡量裁奪。鑒於晚近文獻數量龐大，且受分科治學的約束，全數出版，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若以沈雲龍叢刊三編收書三千種為律，以前述原則選編三萬種（不含檔案、報刊），約為晚近文獻總數的八至十分之一，至少可以作為階段性目標。

現代化進程的開始階段着重於追趕他人，目的是使自己變成他者，達到一定的水準後，則希望重尋自我，想知道我何以與衆不同，我何以成為我。這樣的重新定位，無疑必須從固有的歷史文化入手，進而比較其他，尤其側重於自我認識。在相應的歷史階段，日本、韓國都曾將晚近史料大規模重新印制，甚至沒有所謂「現代化」過程的美國，也十分重視其早期歷史。也許按照人均收入，中國離此還有相當距離，但由於地域差異大等等原因，較發達地區已經開始重樹自信。大規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此其時也。

與近代史料相比，號稱浩繁的古代典籍不過九牛一毛。而就保存期限的長短而論，近代機器紙遠不如古代手

工紙，目前幾乎到達臨界點。晚近文獻，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護的層級，整理辦法，又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規則。照現在毀損的程度與速度，用不了多久，許多重要史料將像地球上的生物物種那樣永遠消失。若到如此地步，則中國幾無可以整理之書，亦無可以整理之人。當務之急，應是多快好省地有計劃大規模原樣影印出版各種資料，首先解決保存與使用的兩難，讓更多的學人能够便利地看到原本，為從容進行深度整理提供必要的條件。此為大規模整理出版晚近史料的緊迫性與必要性。

中外學術研究的進程顯示，關注時段與層面的下移，是普遍的發展趨勢。如果不能協調史料與史學的關係，探究處理史料與史學複雜關係的良法，進一步提升晚近歷史研究的品味與能力，非但無法憑藉史料優勢，超越古史，反而可能以犧牲研究水準為代價，粗制濫造。多快好省地出版晚近史料，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收藏與保存、整理與出版的兩難，還將對晚近歷史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正是由於資料的不完整與邊際的不確定，使得外來後出的系統大行其道，任意條理解釋，而難以驗證。這種一度被認為是用外來系統條理本國材料的良法，不僅在二者是否適當的方面弊病叢生，即使所謂外來系統，也因海外漢學或中國研究者大都位處旁支邊緣，幾度轉手負販，誠如傅斯年所說：『所謂「理論」，自然總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孫之手，則印版而已』<sup>①</sup>。這在域外一般學人，或可收揚長避短之效，還不失為取巧。國人不明就里，照搬倣效，非但邯鄲學步，簡直東施效顰。或者擔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外學人財力十足，如魚得水，實則恰好相反，大量原生態史料的問世，斷章取義者當然有所顧忌，嚴謹學人也難免臨歧裹足，等而下之者憑藉少量秘笈或借鑒別科陳說獵奇構思而隨意立論的做法或許有所收斂。隨着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史料的邊際日漸清晰，學人應逐漸將重心由看得到轉向讀得懂。當然，那時能否讀得完並理解其本意又會成為難堪重壓，考驗學人的智慧和體力。

桑 兵

①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傅斯年致朱家驊函（抄件），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